

南國的哀愁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之五

季季

篇名：再見南國
作者：王璇
字數：一萬五千一百字
發表日期：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六日
發表刊物：聯合副刊

一、小說背景

探看「再見南國」的小說背景，就像面對一堆冗長雜亂的繩索，必須耐心、細心地加以調理，才能理清其中的糾葛。

首先，這篇小說的地理背景是在日本的廣島；對中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而言，它是像烙印一般不易忘記的名字。這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毀於原子彈而使世界重新建立和平秩序的城市，經歷過戰後的蕭條和滄桑，終於漸漸回復元氣，於今又成了繁華的現代化大城。它和長崎一樣，是一些好奇的外國人觀光日本憑弔舊塵的必遊之地，一方面則是崇尚「大東亞共榮圈」者的警鐘。

事實上，政治上的「大東亞共榮圈」已隨廣島被炸而成廢墟，短小精幹的大和民族，懷着戰敗國的羞恥，又受到擴充軍備的限制，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漸漸發展了經濟上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國民也以「經濟大國」沾沾自喜。在這樣的事實和心態之下，一些短視的日本商人，擺出「有錢就是大爺」的姿

態，在經濟之外更作「人性的侵略」；把臺灣形容為「男性天國」即是他們的「傑作」之一。

其次，在時間上，「再見南國」的現實時間背景不足兩年，但透視到小說的背後，它卻牽扯到馬關條約、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日本投降、大陸淪陷、國民政府遷臺以及臺灣開放觀光旅遊等遠近交綜的歷史背景。這些背景在小說中各有其因果相傳，於人物和故事中衍生出微妙的組合。

整個故事是從四個大學教授和一個中國留日學生在一起喝酒談天開始。四個大學教授中的老謝，「媽媽是花蓮阿美族，爸爸是平地人」，其餘三個都是日本人。這五人在一家酒館喝酒至半途時，設計讓其中年紀較大，「跟他喝酒也沒什麼意思」的加藤教授先回家，四個人決定再找一家酒館喝酒，最後渡邊教授對老謝說：「啊，忽然很懷念臺北的林森北路了，好，決定了，我們就去『南國』，那裏有你們的同胞陪酒，很像臺北呢。」

在南國酒店的大門前，一張「大白布上漆着血紅大字的廣告」，廣告詞是：

「閣下不必乘飛機遠赴臺灣，同樣可以享受號稱

『男性天國』臺灣的南國之夜，本店擁有十數名臺灣美人，熱情招待，服務『滿點』，有閣下意想不到的浪漫氣氛與異國情調，本店就是閣下近在眼前的天國，歡迎光臨指教。

店主敬白

整篇小說通過老謝第一人稱的敘述而逐步展開，當他們進到店內，老謝看到「一個女同胞正拿着麥克風在用五音不全的日文唱着一支已經老掉了牙的日本歌『明治一代女』；而『店裏的昏暗、吵雜、嘻笑、烟霧……一切都和上星期一樣，唯一不同的也許是我的女同胞們換了制服，其實也還是那種開衩開得幾乎到腰的旗袍，只不過是紅的換成了銀白的罷了。』」

這些「女同胞」都是拜政府開放觀光之賜，以「觀光簽證來日本的，兩個月，可以延期一次，一共四個月」。她們在臺北時可能都是一些小夜總會的歌手，經過旅行社的人介紹，懷着賺取高薪和出國演唱的美夢，到了日本後才發現「純唱歌」的薪水沒有原來講定的價錢那麼高，去向店長理論，店長却說要賺錢就得像他店裏別的歌星一樣做兼差，「他可以介紹可靠的客人。」

這裏所說的「兼差」，其實就是「賣春」，在法律上是違法的，店長負責介紹「可靠」的客人，就是要安撫賣春女子的恐懼感，讓她能「安心的賺錢」。

事實上，臺灣女子赴日賣春並不是「新聞」，也不是開放觀光護照後的「主要併發症」。過去少數赴日賣春的女子都是以「應聘」的名義出國，在日本可作較長時間的居留。開放觀光護照後，持用觀光簽證入境日本，至多只能停留四個月，雖然有些女子因發覺上當不願久留，流動性很大，但仍然有不少無知女子做着「前仆後繼」的「烈女」，要嚐嚐「出國演唱」的滋味。如此的相互循環，酒店常有新臉孔出現，反而成了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人的引力！這豈不是「女同胞」的悲哀和國人的羞恥嗎？

二、情節

「整個晚上似乎都是加藤教授一個人在說話，也許是因為他喝了酒，也許是因為他上星期剛從中國大陸旅行回來，急着向我們報告他的見聞。他說完了上海也有男女大學生同居的事以後，他的話題又一下子

轉到四十多年以前他在上海和中國舞女談戀愛的事上去了。加藤教授固然興高采烈，口沫橫飛，可是我們幾個都聽得累死了。」想要設個計讓加藤先回去，白頭髮的加藤教授却繼續說着「日本戰敗，他被遣送回日本時在碼頭等船，那個中國舞女送了一包紀念品給他，打開一看竟然是一綹頭髮的事」。

好不容易「把加藤教授推送上車以後」，教法文的吉野教授問大家「去那裏？」教生物的老杜建議去「南國酒店」，一行人就坐上計程車駛向「南國」。

一部車子正好坐四個人，這四個人恰好是兩個中國人——老謝和寧杞；兩個日本人——老杜和吉野。老謝是在日本教書，寧杞是中國留學生。「老杜是我們學校的生物教授，他叫渡邊健兒，他自稱老杜，是因為他曾經在師範大學華語中心念了兩三年中文，他能說流利的中文，他自己說這是在林森北路一帶喝酒鬼混的成績……」

「車子經過『和平公園』的時候，吉野指着公園中一個被電燈照得閃亮的圓形的教堂式的遺跡對着我們說：

『原子彈就是在那地方丟下來的，我的家就在那

後面，我爸爸和妹妹統統死於原爆，我因為媽媽剛好帶我去京都的外婆家，所以留了下來……』」

說了這句觸景傷情的話後，吉野問老杜「那時在哪裏？」老杜說他那時在天津，並說明「剛才老加藤不是一直在吹他和中國女人的戀愛史嗎？你知道我為什麼急着把那老傢伙趕回去嗎？因為我聽得煩死了，老實告訴你們，真正和中國人談戀愛的是我爸爸，我就是最好的證明，我是戰爭的遺產。」

原來當年老杜的父親愛上了一個中國女人，和她生下了老杜，終戰時老杜已四歲了，他的父親把他帶回日本交給日本太太撫養，老杜就在日本母親口口聲聲「支那清國奴」的罵聲中長大。這段剖白，使得老謝「一下子懂了老杜好多事，比如他到師大去讀中文，他一個人住學校的宿舍而不回家裏住，以及他對此地留學生們的特別照顧等等。」然後老謝不免好奇的問起老杜的「中國媽媽」，老杜說「她是蒙古貴族，一個什麼王的女兒」；「也許還在天津，也許真的回蒙古去了」。至於他的父親，「做了三十多年的市役所的職員，去年退休了，上星期他跟着訪問團去了中國大陸……他自己相信他死前一定能够再見到我媽媽

，我很小的時候每次他帶我在海邊散步的時候他就這麼說，已經說了三十多年了，現在終於去了。」

到了南國酒店的門口，只見「站在門口的還是上星期看到的兩個人，男的戴着瓜皮小帽穿着長袍，嘴上還貼着兩道彎彎的八字鬚，就像日本電視上常見的耍寶的魔術師，女的也還是那件開衩幾乎到腰的大紅旗袍，兩個又滑稽又討厭的人一左一右地站在門口招徠客人。」

他們剛進去時，「一個女同胞正拿着麥克風在用五音不全的日文唱着一支老掉了牙的日本歌」，及至他們落了座，老謝看到「唱歌的又換了另一位我的同胞，在扭腰擺臀地唱着一支國語歌，歌詞聽不大懂，有喝醉了的日本人吹口哨，發怪聲，他們也似乎根本不管她唱些什麼，只注意她旗袍開衩的地方……」

這一切都符合南國酒店所標榜的「浪漫氣氛，異國情調」。

他們開始要喝酒了，店長介紹了一個新來的女孩來陪他們喝酒。這個女孩叫駱霜，「說着很破的日文，可是聲音很好聽」，她長得「不很高，短短的頭髮，因為瘦所以眼睛顯得特別大，是一個很清秀的女孩

。」她介紹自己是臺灣的泰雅族，父親已經去世，「原來住在新竹尖石鄉，四年以前搬到梨山去了，我媽媽在那邊種梨。」

她是拿觀光簽證來日本，日期是兩個月，但可延期一次，共四個月，可是駱霜却說「我不要延期了，下個月底到期我就回去了。」

年紀較輕而說話非常直率的寧杞問她「為什麼？許多人不是死也要往外國擠嗎？為什麼妳擠出來又急着回去？」

駱霜解釋「有人想出來，有人想回去，都是看人而異」，但所以急着回去，是因「在這裏我受不了，原先我是在華欣飯店唱歌的，他們這邊的店長到臺灣找歌星，說是出國演唱，可是來了以後才發現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而且待遇和在臺灣所談的也完全不一樣。」寧杞問她是否去「找他們理論」過，駱霜又說：「找過了，他說他如數付了錢，我沒有拿到的是中間旅行社的介紹人吃掉了，他還說唱歌哪有那麼多錢好賺，要賺錢就得像他店裏的別的歌星一樣做兼差」，寧杞馬上不客氣的問道：「差兼？妳是說陪客人睡覺？」駱霜不情願的回答：「何必說得那麼難聽？反正

「你知道就好了！」寧杞却又不放鬆的說：「那妳爲什麼不？臺北不是有很多女人這樣賺錢的嗎？」

「駱霜緊皺了一下眉頭，好像有點生氣，但又不好發作」，她凝望着寧杞說：

「大概跟你所說的出國是一樣的吧！有人做，有人不做，也還是看個人啦！你以爲兼差的錢好賺是不是？上星期我的店裏才被警察抓走了兩個。」

兩個人一問一答時，「胖店長又轉到我們這邊來了，拍了拍寧杞的肩膀說：『她平常陪客人喝酒活像個啞巴，可是和你們倒是有說有笑的，畢竟還是同胞的緣故吧？對不起，我來掃你們的興，該她唱歌了：』」

胖店長職業性的和老杜說着黃色笑話，但是「喧嘩吵雜的酒店好像一下子靜了下來」，因爲駱霜開始唱歌了。「沒想到日本話說得那麼破的駱霜，唱起日本歌來却是字正腔圓的，而且她低沉淒迷的聲音也很適合她正在唱的那支歌：

在南國土佐高知地方的

播磨屋橋上

曾見一個和尚

買了一隻髮簪

啊！……」

寧杞不知她唱的是什麼，老謝向他解釋「這是十九世紀的時候在日本四國土佐一帶流行的一支民謠，據說當時有一個高知縣五台山竹林寺的出家和尚叫純信，愛上了當地一個補鍋匠的女兒，有一次當他在播磨橋上爲他的愛人買一隻髮簪的時候，不巧地被別人看到了，於是人們把這件事編成了歌到處傳播出來了。差不多二十年以前，日活公司根據這支民謠改編拍了一部電影，就是小林旭的成名作『再見南國』。老謝又說：『有人說純信和尚因爲買簪的事被逐出了師門，離開了五台山的竹林寺，成了一個到處流浪的行腳和尚，另一個傳說是好多年以後，純信和尚當了京都一個大寺廟的住持，圓寂的時候只留下一件遺物，就是一支女人的頭簪，總之，是個無可奈何的宿命式的悲劇。』」

駱霜第二支歌是國語歌曲，「也是幽幽怨怨的」，她唱完歌走下來後，却發生了意外事件：在酒店「角落的位置上坐着的三個男人之中的一個穿白色西裝的」把一隻酒瓶在桌上摔碎了，原因是駱霜拒絕了他

們三人中的「老大」提出的「兼差」的要求。穿白西裝的拿着碎酒瓶大聲吼叫着：

「馬鹿野郎！也不打聽打聽這是誰的地盤，我們社長要妳是抬舉妳，平常妳們店長親自送到我們社長家社長還不要呢！哼！我們社長不過是最近忙，沒去臺灣，所以才對妳們臺灣女人有些懷念罷了……妳回臺北的六月花一帶問問，看看誰不知道日本廣島的泉社長。」

這個泉社長「是一個穿着日本和服的禿頭的中年人，帶着眼鏡，手裏拿着一根手杖，他嘴裏含着烟斗，沉默地坐在中間，不斷地用手杖緩慢而且輕輕地敲着桌子」，在他身邊的兩個保鏢，一個穿白西裝，一個穿黑西裝。胖店長爲了息事寧人，趕過去不停向「社長」彎腰鞠躬，解釋又加道歉，穿白西裝的却變本加厲的把半截酒瓶在胖店長的鼻前晃着說：「什麼？新來的就不可以動嗎？不賣身體那她來日本幹什麼？什麼？換別人？你這野郎以爲我們社長是只要臺灣女人就可打發的嗎？哼！老實告訴你這野郎吧！就要她！你敢說不行？你說說看！」

難堪的站在桌邊的駱霜，突然不理胖店長和白西

裝的談判，跑回老謝他們這一桌。她被潑了酒，「臉上冷冰冰地沒有什麼表情」，「胸前和頭髮上都好像濕淋淋的」，「發散着一股威士忌的酒味。」

但是這弱者的逃避並沒躲掉災難，只見那白西裝「忽然轉身朝着我們用半截酒瓶指着我們這邊大叫：『妳！臺灣女人！妳給我站過來！』」

駱霜「冷冰冰地直站着，但卻沒有絲毫害怕的樣子。那邊，白西裝又不耐煩地對我們這邊吼叫了：『喂喂！你們！你們聽到沒有？叫那個臺灣女人給我馬上過來！』白西裝用半截瓶子指着我們，用的是一種上級命令部下的很粗魯的日本話。」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老杜忽然很粗暴地一把把駱霜按到椅子上」，叫她和吉野「在這邊坐着」，他則帶了老謝和寧杞走過去。「社長還是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用他的手杖緩慢而且輕輕地敲打着桌子，但是兩眼却直視着老杜。」白西裝則又嚷着：「誰叫你們過來的？我叫的是那個臺灣女人！」而老杜則「完全不理他」，他注視着社長，一字字的說：

「她不賣，她是這位寧君的未婚妻。」

出人意料的，社長竟然「取下了口中的烟斗」對

老杜說：

「渡邊教頭果然不同凡響啊！今日幸會了，今天的事就看您的面子，讓一切像流水一樣過去吧！……」又說：「小輩們無知，不懂事，對渡邊教頭可失禮了，請別介意，改天再叫他們專程向您道歉好了。」

大家都不明白事情為什麼會因老杜而有了好的轉機，「社長」一夥三人走了之後，老杜也不說明，大家心情都不好，「悶聲不響地喝着悶酒，酒店打烊，我們也就散了。」

然而三天之後，老杜終於嚐到了被「專程道歉」的滋味；「午夜一點左右在流川『南國俱樂部』的門口，兇手用二十公分長的短刀向老杜的腹部連刺了兩刀以後走了……」

老謝在報上看到這條大新聞，又從報上對老杜的介紹裏得知「老杜進大學之前曾進過日本自衛隊的特別作戰訓練班，他是劍道五段，退役以後曾在『清心武道館』任劍道教頭兩年……」老謝終於從這段歷史裏明白了「社長」稱老杜為「渡邊教頭」原因。

老謝和吉野去大學附屬醫院探望老杜，但老杜住院後拒絕會見任何人，他們從護士口中得知早上有兩

個外國人也來過，「男的很高大，臉上左眼下有條疤痕，女的穿着白衣藍裙，頭髮很短很像學生的樣子」，大概是寧杞和駱霜。後來他們又去外科室找清水教授，「他是老杜的酒友，也是老杜這次遇刺住院以後的主治醫生」，他說「老杜的傷不要緊，大概三星期也就可以出院」了。

學校開學的第二天，老杜打電話到研究室給老謝，說他已出院，但住院期間意外發現「十二指腸上有一個洞，是很嚴重的潰瘍，必須絕對禁酒。」因為開了學較忙，又知道老杜必須禁酒，他們幾個酒友不常見面了。

故事發展到這裏時，最緊張而使人心窒的情節已經過去，開始轉入淡淡的抒情和抒事，三個中國人在故裏突出來，發展出感人的過程和結尾。

整個學期當中，寧杞常去研究室找老謝借錢，借的不多，也從不說做什麼用，「每次他拿了錢就匆匆地騎着摩托車走了，連個謝字也不說。」基於同胞的情誼，老謝每次都「如數地借給他」。

但是學期快結束時，「期末考試以前的一個下雨的黃昏」，寧杞到老謝的研究來，「他淋了一身雨，

眼睛紅紅的充滿了血絲」，而且「全身散發着一股酒味」，他是來向「謝老師」告別的，因為他決定「不要念什麼鬼博士」，要回臺灣去了。他還特別解釋做這個決定是因為「上星期四我老頭死了，所以我想了三以後，決定回去」，不只是奔喪，而是「不想再出來了。」他這才讓老謝瞭解他從小失母，和父親相依爲命，長大後父親老是逼他出國，法國、西班牙、丹麥、南美、美國、日本……「一個國家簽證到了期就轉到另外一個國家去，一個店的工打完了，別人不要我或我不想幹了就轉到另外一個店裏去，當然打工以外也在好多學校報過名……」之所以如此，是因老頭「要我一定要在國外成家立業，紮下個根……老頭活看的時候我是不會回去的，何必回去打破他晚年唯一的一個夢呢？他活看的時候，我在國外想他，可是我不能回去，現在我決定回去了，却是因爲他死了……」

寧杞已買好後天的機票，臨別他「突然回過身」對老謝說：「我向你借的錢我都記在本子之了，等我回去，以後再慢慢還你，你也從來沒問過我借錢去做什麼，真的，謝了。」

這是老謝和寧杞認識以來，「他對我說過的唯一的一個謝字。」

寧杞返回臺灣後，老杜得到日本文部省的研究補助金到美國研究一年。老謝也要離開廣島到東北部的一个教會大學教書，參加學校的歡送會後，老謝和吉野又到「南國」去：「南國依舊，只是女歌星們全換了一些新的面孔，她們所做的事，所想的事也似乎和駱霜一樣……一樣是抱着淘金和成名的夢而來日本的臺灣女人，一樣是來了日本後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喝酒的時候，才從胖店長口中得知那次老杜挨刀，大家都不再去南國喝酒的那段期間，寧杞却三天兩天的到「南國」去，等「駱霜換好衣服就和她一道回去……」老謝這才明白寧杞向他借錢的原因。

一年多以後的一天晚上，從美國回來了的老杜，又和吉野、老謝聚在一起喝酒了。老杜談起他自美返日途中經過臺灣，到梨山去找駱霜，意外的發現寧杞「和駱霜一起在梨山種梨」，完全變了，「看起來好像比以前穩重多了……」

那夜他們喝得大醉，老杜口齒不清的一遍又一遍

唱着「再見南國」：

在播磨屋的橋上

曾見一個和尚

買了一隻髮簪

……………

三、人物素描

「再見南國」的出場人物約有十七人，重點人物則在兩個日本人、三個中國人，以及圍繞着他們推展全篇故事的一些陪襯人物。

故事一開始就登場的加藤教授，很明顯是和老杜他們不同時代的人。他白了頭髮，約莫六十歲左右，有了老年人「好提當年勇」的通病，一喝酒就情不自禁說起二次大戰日本佔領上海期間他和中國舞女談戀愛以及戰敗後臨離上海舞女送他一包頭髮的浪漫過往。這樣的故事聽一次是美的，可是聽了許多次就膩了，當然不再受到人們的歡迎，因此全篇進行到五百多字時，這個老教授就被壯年一代的教授「送回去」了。加藤教授在這裏像一篇文章的引文，點出了日本和

中國之間曾有的歷史糾葛。

渡邊健兒，這個自稱老杜的中日混血兒，是加藤教授浪漫故事延伸而出的第二代。這樣的第二代，在日本佔領中國某些地區的期間為數也許不少，不同的只是個人和地點！像老杜，他的父親是在天津和他母親戀愛，生下他後還在天津停留了四年。當時懷着「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也許以為可以長期和中國情人相聚的吧，但是投置在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終於無情的粉碎了這種民族以及個人的夢想。四歲那年，他不得不隨父親返回廣島，在不受日本母親歡迎的生活中成長。心中懷着一角缺憾卻從不對外人提起。偶然提起時則自嘲「不是說私生子都比較聰明嗎？」人家爲了觸及他的傷痛向他道歉，他只淡淡的說：「我一聽到戰爭就有些不舒服的感覺罷了，」因為他是「戰爭遺產」。他在進大學之前曾進過日本自衛隊的特別作戰訓練班，是劍道五段，退役後曾擔任武道館的劍道教頭，這些他也從不向他的大學同事提起。另外一方面，讀生物的他却跑到臺北學中文，前後加起來有四年之久。在日本則對中國留學產特別照顧；住在學校宿舍而不同家去住，這些都說明了他身份特

殊的心理因素。也因此，他在外表和言行上顯出了近乎「浪人」的特質，有點玩世不恭的味道，例如他在學校教學生做生物實驗，竟是找了好幾隻貓來，「叫學生們用威士忌酒灌貓以觀察對酒精的反應」而獲得「貓博士」的外號；又例如特別喜歡到酒店喝酒、在街角小便、衣服總穿不整齊……，這些生活情緒的反應，都和他的潛在心理有關。不過，他最可貴的一點是在駱霜受到廣島黑社會頭子要脅時挺身而出，替駱霜解除了困境，事後却遭到黑社會的武力報復。在他的心裏，「中國」應是不可受欺凌的吧，因為他的生命裏也流着中國的血液！

吉野，道地的日本人，從某一角度來看，他和老杜一樣是「戰爭的遺產」；是未被原子彈炸死的倖存者。他的家就在落彈點旁邊，「爸爸和妹妹都死於原爆」，他是因隨母親去京都的外婆家而倖免於難。或許這創傷是永不能撫平的吧，他永遠是人羣中最沉默而又顯得最理性的人，酒量最大而從來不致醉倒，似乎心中永遠保持某種清醒，以弔念那在戰爭中死去的親人。在日本，懷着這種傷痛的，應不只吉野一人。

這兩個日本人，是二次大戰期間出生而遭遇不同的兩種典型。

「泉組建設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泉樹三郎」是日本戰敗後蒙經濟復甦之利的現代商人的一種典型。這一典型的商人，十多年來一直把臺灣視為「男性天國」，把臺灣女人當作他們生意之餘的取樂對象。

如果嚴格的加以劃分，泉社長並非是純粹的商人；因為他更重要的是一個「廣島最大的黑社會頭子」，出門有兩個保鏢隨侍在側，似乎可以為所欲為，誰也不敢得罪他。然而，不管過去或現在，某些工商業和黑社會勢力結盟同進並非怪事；也因此，許多經濟不佳的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做他們的附庸或甚至不知不覺的做了他們的犧牲品。一旦有人膽敢當面頂撞、不遂所願，就會嚐到他們的報復滋味；所謂人性、所謂良知，在他們眼中或許不值一文錢的吧。

駱霜，這個臺灣泰雅族的年輕女子所走的路，也許不止是目前山地女子的問題，而是不少臺灣年輕女子的問題。她們嚮往「出國演唱」的美名，以為可以因此獲得名與利，但出國後才發現所謂「演唱」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如果堅持已見，不肯隨人「同流合

污」，不但名利無望，連生存的尊嚴都隨時可能被剝奪。這樣的故事，近幾年不止在日本發生；在香港和東南亞一帶也屢有所聞。但是能像駱霜這樣從生活經驗中得到教訓，毅然覺醒回到山地去種梨或從事任何勞力工作的年輕女子，又有幾人？在名利的煙幕下，她們迷失而不復返，心裏痛苦而沒勇氣回頭，其結果是為我們的社會「儲存」了讓人憂心的問題：未婚媽媽、精神失常、自殺……。

寧杞，在整個故事中所扮演的具有衝擊性的角色，和他的日本老師渡邊健兒同樣的強烈。他自幼失母，父親年輕時曾是法國留學生，學成後做了立法委員，使寧杞自詡為「貴族階級」。他身高一百八十多公分，在嘉義時曾被不良少年砍殺，臉上留有疤痕，「有時候他好像對什麼都吊兒郎當，很不在乎的樣子，可是有時候他又好像很不快樂的樣子，經常會悶聲不響地呆呆地望着什麼出神，兩眼顯得空洞而憂鬱」。「他離開臺灣已經四年了，他自己說當時出國一方面是他父親一定要他在外國成家立業，另一方面是臺灣使他覺得『悶得要死』，所以他就出國了。他去過許多國家，最後在美國拿了個碩士，又因為喝酒和美國人打

架而被趕出境，所以才到日本來的，他念畜牧，最大的夢是移民到澳洲去找塊地開個牧場……」而最後，他却因為愛上了駱霜以及父親去世，終於改變了這個夢想，回到臺灣的梨山，和駱霜共同墾拓梨園。

在整篇小說中，寧杞最後決定離開日本對老謝所作的傾吐，幾乎是臺灣年輕一代的代表性心聲；顯示了他們精神上的重壓和心情上的迷惘：「我老頭把我送出國的時候，對我說我們寧家就全靠我了，要我一定要在國外成家立業，紮下個根，這樣他就死也安心了。現在老頭總算安心地死了，雖然我這些年也沒成家立業，只不過像個浪子一樣從一塊土地轉到另一塊土地上罷了，但是你知道，老頭活着的時候我是不會回去的，何必回去打破他晚年唯一的一個夢呢！他活着的時候，我在國外想他，可是我不能回去，現在決定回去了，却是因為他死了，想想也覺得亂矛盾一把的。」多麼委屈而堅韌的年輕人！

老謝，這個全篇故事的敘述者，從文字中只知他的「母親是臺灣花蓮阿美族，父親是平地人」，在廣島一所大學教書；為什麼會到日本，教些什麼，却都沒有說明。他的年齡、外表、對整個故事的轉折和

起落的心情，在小說中也都隱藏着。他和他們彷彿「同臺演出」，但對白極少，更多的時候是努力的觀察和記憶，在記錄一切時又不加進個人的批判。這個角色在故事中看似不突出，但他却像一座沉默的橋樑，讓「兩端」的人有機會在橋上互通氣聲，傾吐積鬱，塑造了一個讓人感傷、感動的文學生命。

四、一些我見

或許是我孤陋寡聞，我竟不知道王璇也寫小說，因此，第一次看他的小說也就覺得格外可喜。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出生於山東昌邑縣的王璇，本名王孝廉，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在彰化高中教過書，於五十九年八月留學日本，後來獲得廣島大學文學研究科碩士，目前在福岡西南大學文學研究所任副教授，教授中國神話和小說。

這些年來，王璇較為人熟知的是他留學生涯中斷斷續續寫出的「廣陵散記」和神話故事，最近一二年也做報導文學的工作。

這篇「再見南國」，就小說文字和結構而言，尚

有許多有欠完美之處。在文字方面，由於作者採取老謝這個角色做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而且可能因為故事本身的真實部份較濃，作者創作小說的經驗不豐，在取捨之間未能做適度過濾，致使文字顯得有些拖泥帶水，特別是代名詞和連接詞用得太多，減低了精鍊的成份，流於瑣碎。

在結構方面，前三分之二較為緊湊，步步扣人心絃，後三分之一則因加進一些非必要的描述而顯得冗長鬆散。這一部份如果能抽離某些既定事實的牽絆，從更超然的角度入手完成，這篇小說的藝術成就當更高。

除去上述的缺點，「再見南國」是最近幾年來，以中日關係的過去和現在為背景所寫的小說中最成功的一篇。在小說中出現的那些人物和他們的言行、遭遇，事實上我們已在實際生活中斷斷續續的聽聞，有憤慨、也有無可奈何。作者有心的把它們「化零為整」的全部呈現出來，不但具有現實的衝擊性和嘲諷性，也給做為現代中國人的我們幾許哀思；到底「南國」的噩夢何時能了呢？小說中的「南國」已經「再見」，現實中的「南國」却依然存在！